

少戀心境，多寫現象

--許達然教授訪談錄

廖玉蕙 2002.11.09.

一路從洛杉磯、舊金山、愛荷華，直奔芝加哥，接觸了無數的華文作家，聽他們滔滔談論文學，表達對寫作的意念，發現作家的嘴和筆，一貫的流暢。獨獨在芝加哥，聽到了不同的聲音—所有的回答，都比預料中的簡短許多。彷彿問題才拋出，答案已然結束。散文家許達然教授寫出了堪稱典範的散文--精緻、典雅，沒料到本人卻是如此木訥、寡言！初始雖然有些詫異，但是，仔細一想，卻又立即了然。許達然的散文之所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受，不就正是這種言簡意賅及不浮誇的誠懇嗎？

諾大的屋子，四壁幾乎被書全填滿了！像一個小型的圖書館。然而，卻又不像一般的學者--常常辯稱「亂中有序」，許教授的書是真正的井然有序！不單是乾淨整潔，裡頭還隱含著某種無法言說的氣息，像許教授臉上一逕掛著的微笑，你確知那絕不是虛與委蛇，而是自信後的謙虛溫文！而屬於他的書，竟然也在無言中露出被仔細閱讀後的舒暢表情！一點也不張狂，只靜靜坐看，從客廳一路排排坐到地下室的書房。

許教授的夫人，忙著張羅茶水並安撫兒子寄養的那隻黑狗。領著我們前來的邱秀文，不時地幫著我提問，卻仍不免常常因許教授的寡言而出現短暫的沈默。準備好的話題，也因為答案的簡淨而提早宣告了結。回來聽錄音帶，發現這幾乎是所有訪談中唯一問話多過答話的一卷奇怪的錄音帶。提問的我，聲音裡隱約透露出答案過度精簡的焦慮，答話的許教授卻一逕地好整以暇，不時陷入沈默的長考。在聲音空白的錄音帶空轉中，我彷彿再度看見許教授似笑非笑地低頭沈吟。

廖：我們都知道許教授是非常有名的歷史學者，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您求學的經歷呢？

許：我雖然對文學有興趣，但我從中學就認為歷史報國很多，所以就決定學歷史，以第一志願考到東海去。我在大學念歷史主要是唸西方史、近代歐洲思想

史，畢業以後就當助教。當時學校有一位教授，在東海是教美國史的。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是中國史，所以我也就開始看一些以英文寫的中國史，因此對中國史產生興趣。來美國以後，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清朝的社會史，現在學術上的興趣也是在搞社會史。以前因為生活的關係用英文寫，這幾年開始用中文寫。

廖：您既然學的是歷史，又是如何跟文學結緣的？

許：小學時，家住台南市鬧區，小學五年級時，我常跑到台南市立圖書館去，東看看、西看看，那時有王雲五編的商務書局萬有文庫，小本的，看的多半是翻譯的，就開始對文學有點興趣。但是，都沒有發表，一直到初三，一發表，就沒完沒了。

廖：到美國以後還寫散文嗎？

許：來美國以後，因為研究和教書，寫的就比較少了，主要是教書嘛！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離開了自己住過的地方，再寫那個地方就比較不那麼完整，所以就不大敢寫。當然！自己的 research 也花了很多時間。

廖：您早期的散文比較抒情，相形之下，後期好像對社會的關懷更多一些，那是跟您的研究有關係嗎？

許：沒有關係！不過，在台灣的時候很抒情，是因為不懂事。後來覺得抒情好像沒什麼意義。我覺得寫散文，抒情是最容易的，比較難的就是超越抒情，比方說社會的、時代的。因為自己遠離那個地方，就覺得自己不能夠表達得很好。

廖：您最近出了一本《許達然素描》，那是您最新的作品嗎？

許：沒有，是《新新聞》希望把我過去寫的作品分成兩本重新出版。一本是早期的，一本是出國以後的。我早期的那些作品，因為《遠景》有重新排過，要出版的話，就會碰到版權的問題。後期的這幾本，版權沒有問題，所謂沒有問題，是說出版人正好是認識的，所以就出了後期的，其實都是以前的作品。

廖：其中，最近的作品是一九九二年寫的嗎？

許：我大概五、六年沒有發表作品，以前發表也跟痙弦有關係，我們是老朋友嘛！

一九六四年的青年文藝獎，他得的是新詩，我得的是散文。

廖：後來您很多作品都是在《幼獅文藝》上發表？

許：對，都是痙弦編的時候，痙弦編《幼獅》，我就投稿《幼獅》，痙弦去《聯文》我就去《聯文》！

廖：這真是「千里馬遇到伯樂」！早年看您的作品《含淚的微笑》，當時真的是非常地膾炙人口；就算是後來出國所寫的文章，雖然寫的是散文，但其實詩的感覺相當濃厚，您是刻意營造這種「以詩入文」的散文文體嗎？

許：我覺得散文基本上也是詩，不屬於小說的範疇。事實上，從廣義上講，文學整個都是詩，小說當然也算是詩。散文既然很難像小說那樣講出一個故事，我覺得在敘述上跟內容上應該是詩的，這是我個人的偏見，所以盡可能注重技巧，也許寫出來的，讀者不一定喜歡。但我一個假設就是，因為散文比較短，所以基本上要跟詩一樣，寫出來能夠讓人去想，而不一定說一看就懂。因為在大眾傳播這麼方便的時代，一看就懂常常是大眾傳播，文學應該有別於大眾傳播，應該要有它的另外方向，要更能夠讓讀者去想。至於寫出來的，別人怎麼解釋，那是作者沒辦法能夠去掌控的。

廖：就我了解，西方很少以散文名家的，大多都是寫小說或寫詩的。那您當初選擇散文來從事創作，是不是跟您一向淑世的觀念有關係？

許：我不知道，大概是自己沒辦法寫詩吧！因為西方廣義的「詩」，事實上包括小品文和小說，主要是小說。我們所謂「散文」，大概是西方的 Essay 吧！而 Essay 有一個盲點，論述性的多，抒情的比較少。所以西方要找到中國的這種傳統抒情散文，好像並不多，他們的散文詩可能比較接近中國的散文，不過西方的散文詩也比較短。

廖：您提到最近的作品少了的原因是因為花很多時間在從事研究工作。其實，會不會是因為研究學問對寫作靈感其實是一種耗損？

許：倒不會，只是不願意寫。因為我喜歡東看西看，所以關於一些文學、文化的

理論，雖然不敢說看很多，倒真的很喜歡看。至少當代的這些文化理論，我大概勉強可以算掌握，所以，事實上要繼續創作的話，反而可以更好，只是不知道爲什麼.....。

廖：所以，我覺得很難能可貴的是，您把這麼寫實的東西錘鍊得這麼好。我知道您最近得了吳三連的文學獎，也得到了台灣文學界的肯定。您曾經刻意下過什麼鍛鍊的功夫嗎？

許：也沒有，只是自己覺得文學無論如何是需要注重技巧，我又不願意一直抒情下去，所以，儘可能內容跟技巧並存。

廖：大部分的早期文學青年都喜歡看文學書籍，當時您有沒有覺得有什麼作家是值得您學習的？

許：大概也是西方的，近代中國作家的散文，老實講，我都不喜歡，像徐志摩也不喜歡。這並不是說自己狂妄，真的就覺得不喜歡，就覺得只是在玩弄文字，沒有什麼。事實上，我倒是覺得他們寫的，沒有像宋詞、元曲那麼樣的有意境，所以，比較起來我並不喜歡二十世紀的中國散文。講到散文，我比較是喜歡西方的。

廖：我記得我去訪問聶華苓的時候，她說生活經驗跟語言的儲蓄是相當重要的，也是相當吃力的，可是我覺得您在寫散文的時候用了相當多的俗話和台灣的俗語，那您是如何來做這樣的儲蓄工作？

許：也沒有說在做什麼儲蓄的工作，我認爲語言是活的，既然大家在台灣這麼久了，我也不懂客家話，閩南話多多少少會很自然地放進去，所以我假如放進我的散文的話，一定是那種不懂閩南話的人也看得懂的話，如果是那種不懂閩南話的人看不懂的話，我就不會放進去。

廖：就是讓大部分的人都看得懂您的文章？

許：不只大部分，是看的人都能夠懂，而且我挑的都是一些雖然是俗語，但都是比較典雅的，因爲閩南話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唐朝的。

廖：就是不只是音譯而已，而是還要有文字來源的？

許：是，本來就有文字，把它檢回來而已。

廖：那您對台灣的文字有研究嗎？

許：沒有特別的研究。

廖：我覺得這很難，我覺得我在寫作的時候，比方說我台灣人，但我寫到我母親那個年代的對白時，常常覺得非常的困擾。可是我看您用的文字真的都是非常的典雅，您現在在家裡還是說閩南話嗎？

許：對，我們講閩南話，一半、一半。

廖：我覺得您文章裡面的旋律有一點悲傷、沉鬱的感覺，並不是那麼的開朗。您是對所處的環境不甚滿意，還是對這個社會求好心切？

許：因為我個性比較憂傷，講好聽的，就是純抒情，或者就是不會那麼開朗，想久了，就不會那麼開朗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很少跟外界接觸，從小就比較內向。

廖：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許教授真的是比較靦腆，比較木訥一點。很多的評論家都說您的文章之所以成其大，是因為對古文的繼承，以及對西方文學的汲取。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的閱讀經驗，除了您的歷史本行之外，還看些什麼書？

許：說起來很慚愧！在台灣的時候，讀的大部分都是西方的東西，相較之下，對中國的文學比較不那麼欣賞。比方說我唸東海大學的時候，我們每個 summer 都可以借書回家，我記得那個時候是可以借三本，所以大一升大二的那個 summer，我就把《雪萊全集》借回家，看的大部分都是這種，不會去看中國的一些東西。像《紅樓夢》，我也是來美國才看的，我太太在中學就看過了。不過也幸虧來美國才看，覺得年紀大了，在美國看《紅樓夢》，說不定反而可以有更深的體會。古典的文章我真的看得很少。古典詩是看得很多，古典小說譬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西遊記》，我都只看了前幾回，很慚愧！

廖：可不可以談談您的文學信念，比方說您覺得寫作可以只「為藝術而藝術，為文學而文學」，或者是需要肩負一些社會責任？

許：我是覺得文學只為藝術是不夠的，但文學基本上屬於藝術的，一定需要有藝

術性。但要是文學只為藝術的話，那跟繪畫要如何區別？因為畫的藝術性就可以去感覺出來。所以文學應該不只藝術，總而言之，應該是為讀者而寫，因為讀者他不一定只欣賞藝術，他要求更多。所以，無論如何一個作者他寫是為讀者而寫，不是為自己而寫。我們常說文學常常是為自己而寫，我覺得這不夠，應該要為讀者而寫。像沙特不就講過嗎？作品沒有被讀就不存在。

廖：您覺得文學也可以是一種社會改革手段嗎？

許：那就看有沒有真正影響到他的讀者。既然文學是為讀者而寫，那讀者受到什麼程度才可能去思考？只有整個社會去思考，才有可能改變。文學要改革社會、政治，我想終究是很難的，只是一種理想。

廖：我覺得在您的寫作裡，對這個社會傾注了很多關懷，其實也有凸顯社會荒謬狀況的一個動機，好讓大家去思考？

許：也希望讀者去思考。但讀者思考不思考，完全超越了作者的能耐。

廖：您這些年還看台灣的文學作品嗎？

許：一直都在看，每次回台灣都看，而且，我用大學圖書館，藏書很豐富，基本上台灣的文學作品都有。

廖：那您覺得目前台灣的文學狀況，跟您早期在寫作時的文學狀況有差別嗎？是更樂觀，還是覺得比較悲觀？

許：也沒有說更樂觀或者悲觀，台灣的文學發展基本上跟世界的文學發展其實是同步的，所表現出來不一定適合我的口味，但我覺得這是整個的趨勢，我是贊成的，而且甚至是鼓勵的。

廖：您現在還有跟哪些台灣文藝界的人士交往嗎？

許：因為我認識的人很少，基本上跟文藝界的人沒什麼交往。

廖：您有很多文章都刊在《笠詩刊》。

許：我是《笠》的會員，因為從前我跟他們捐點錢，就把我的作品放進去，就變成會員，不過也很久沒有寫了。

廖：如果一個年輕人想要來從事文學創作、投入文學活動，您覺得最重要的是要

涵養一些什麼樣的功夫？

許：我想任何人多多少少都有文學發表的能力，只要多讀點書，基本上肯定每個人都有這種創作能力。因為透過語言表達自己所想的，這就是「文明」，人以外的生物並沒有。因為我們用語言思考，所以，無可避免地就會被語言控制。一個比較好的作者，就是控制語言的能力比被語言控制的能力多一點。

廖：您在去年得到「吳三連文學獎」，心情如何？

許：心情還是一樣，我覺得台灣的「獎」太多了！「獎」在我來看，是一種社會控制，可好可壞，所以獎太多的話，不一定對那個領域有好處，我一向就這麼認為。

廖：您認為「獎」的量應該少一點、質精一些嗎？

許：因為「獎」既然是一種社會控制，那麼，每個社會都有社會控制的方法，所以獎在每一個社會都一定存在，什麼獎都一樣，不一定單指文學。因為有獎，雖然不一定為「獎」而寫，但得獎有一些 Criteria，經常是必須符合那些 Criteria 的人，他才能得獎；假如要超越了那些 Criteria 反而不能得獎，可是，有時候就是要超越了那些 Criteria 的人，他是比較好的。

廖：所以，您得獎了，反而覺得惆悵嗎？

許：我是覺得獎太多的社會，恐怕都是有問題的社會。「獎」的設立，多半都是為了 Control 這個社會或是人民的思考。

廖：這說起來好像有些道理哦！今年如果某一種題材的作品得獎，明年就常有一大堆的人來追隨！

許：而且，我們都做過評審嘛！做評審就會知道，得獎是很難區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。「獎是一種社會控制」不是我說的，是一位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說的。

廖：您做那些歷史研究對寫作有沒有影響？

許：沒有吧？文史畢竟不一樣，不過也很難講，現在也有人認為文學跟歷史是一樣的。因為歷史是用解釋的，文學也是用解釋的，解釋人的思想，基本上都

是解釋的。文學可以虛構，但歷史事實並不是真的事實。我們所謂的「歷史事實」事實上是經過解釋的。

廖：既然是解釋的，那歷史怎樣才能才能維持客觀？

許：有人講，沒有客觀的。假如什麼都解釋的話，就沒有客觀。歷史既然是解釋的，那就是主觀的。今天的解釋到明天又不一樣，這個地方的解釋和那個地方的解釋又不同。

廖：剛剛你提到，說你散文中的語言盡量寫到不只是大多數人、幾乎是所有人都能明白的境地，可是，實際上也有人說他們看不懂。如此說來，這個標準其實也很難拿捏的？

許：就看讀者怎樣去看，我知道大家都認為我寫得比較堅硬難懂，我是盡量要把它濃縮，廢話少說，可是讀者他就覺得何苦呢！我讀是要享受，所以，這是沒辦法的事。

廖：所以，有些評論認為你太土，有的卻認為你太洋。太土是是土語很多，洋的部分是象徵手法很多。寫作真難啊！要讓理論和創作一致，很不容易。您曾經說過，寫作要「少戀心境、多寫現象」，這是你從早期的抒情風格趨向寫實的原因嗎？

許：因為人既然是社會人的話，都寫自己就等於不必寫了。人既然在社會裡頭，多多少少跟社會有關，他寫的這個人一定還是跟別人有關，即使是他要孤立自己、寫自己的話，他還是活在那個社會。所以，我就覺得寫自己真的沒有什麼意思。幾乎可以這麼講，我是希望把散文詩化、小說化，平常我們認為詩是比較 personal，小說跟社會比較有關係。至少我現在寫的話，我希望把散文詩化、小說化，希望是這樣做啦！心理上這麼想，至於寫出來的，別人怎麼看，我就沒辦法了！

廖：您說文學不該只寫個人，應該寫社會。梭羅（Henry David Thoreau）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每個人都應該寫他自己的故事。我相信他的意思是，每一個人雖然看起來是個人，但是若有機會全部表白你的真實生活，其實是跟別人都

有所連結的，不連結的是假的我，那個假我自然是沒有意義的。所以，文學也許應該會慢慢傾向每個人都寫他自己的故事，然後，接觸別人的生活。然後，才會造成一種聯繫、共鳴跟影響力。

許：梭羅雖然生活是孤立的，但是，他是參與社會的，所以，他寫自己時，事實上是寫一個社會的。可是，很多作者是並沒有參與社會的，所以，他寫自己是和社會沒有連結的。梭羅不同，他本身是反對美國打墨西哥的。

廖：杜國清先生說您寫的的文章「多詩想、少詩情」，你覺得這個評語還算恰當嗎？我覺得你早期的作品雖然比較偏重抒情，但是還是帶著濃厚的社會觀察，是不是？

許：那是因為當時的生活有限，生活空間狹小。

廖：我看過多年前您寫的一篇散文，提到一個人在家裡被殺鄰居看見了，卻都沒有伸出援手。這樣的事，居然活生生地又在今年的台灣都市重演，一個女孩在陽台呼救，鄰居看見了，竟然事不關己的袖手，以致於孩子被害。後來，孩子的母親出現在電視上控訴人情的冷漠，當時，若有一個人報警或什麼的，就能拯救一個少女的生命。我看了真是心有戚戚，這和許教授多年寫的文章不謀而合！

許：那是一九六六年寫的。那是 New York Times 報導的真實事件。

廖：事隔三十六年，在二〇〇二年的台灣又同樣發生，若是人們能記取教訓就好了！那您最近還有什麼寫作計畫嗎？

許：偶而還在寫，但是都沒有發表，大概五年沒發表了。寫了也不知道投到哪裡去！真的。所以，寫了就放著，這幾年都是這樣。寫了半天，說不定還是自己看。

廖：或者您會直接出書？

許：不會！要出書，也會先發表。

廖：難道這是一種策略？等要出書前的一陣子，像放煙火一樣，到處發表，造成轟動？

許：(笑) 沒有啦！如果沒有感受的話，就不會寫。寫作沒有計畫，有計畫的通常是我自己的 research。

廖：您是把寫作當作一種工作之外的…我不能稱之為「休閒」，因為您的寫作實在很不「休閒」！您是自我要求很高？

許：可以這麼說吧！我這些年，計畫在寫幾本書，都是有關台灣歷史方面的。第一本是清朝台灣人民的起事和台灣的歷史發展，第二本是台灣漳泉的族群械鬥與本土發展。就是閩南和客家打架，閩南人當中的漳州和泉州人打架，械鬥後的台灣人之間的 social integration。第三本是台灣的土匪，我是把它量化。量化就是將我蒐集到的偷竊搶劫各種檔案、清廷檔案，找到的就列表，總共已經找到兩千六百多件，作分析。第四本是台灣社會衝突，第五是從前的傳統社會組織，第六本是台灣的社會史，從荷蘭時期一直寫到現在，第七本是台灣文學史論，事實上已經寫的差不多了。我是用史論的方式，不是文學史，從原住民的神話寫到七〇年代，加以分類，譬如說，清朝主要是詩，當代就散文、詩、小說。現在就全心全力在弄這幾本書。

廖：您在國外，做這些研究，資料上足夠嗎？需不需要回去找？

許：檔案的話，就需要回台灣的故宮和北京的中國歷史檔案館；二手資料的話，恐怕美國比較多，因為美國圖書館設備不錯！西北大學沒有中文所，所以，我多半利用別的學校的圖書館。以前用英文寫，這六、七年來，開始用中文寫。一次進行七本，所以比較辛苦。

廖：歷史我是不懂啦，不過，真的非常期待您的台灣文學史論能早日完成。

許：台灣文學一定要追溯到原住民，現在一般寫的都是漢族的文學史，我覺得非常不公平。因為漢族神話不精彩，主要都是原始的民族。

廖：您是如何去找到這些原住民神話？

許：日本人蒐集的，現在還沒有全部翻譯出來，現在中研院要翻譯。

廖：您可以直接看日文？

許：可以，日文是來美國學的，在台灣沒學。所以，日文要我翻譯，我不敢。看

是看，似懂非懂。

廖：這些原住民資料，是他們自己寫的，還是…

許：是日本調查研究的，台灣南天書店有影印出來，好像五大本或六大本。我是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把原本影印出來的。我的研究主要是根據這個，最近，台灣有些原住民，他們也做了些研究、一些新的調查，人類學者在一九四五年以後，去作一些人類學的調查，有時候會牽涉到一些神話，我是根據這些加以整合。

廖：台灣做歷史研究的，多半是往外看的，您反倒回頭去。您雖然離開台灣很久，卻似乎和它還相當接近，是以研究來聯繫？您這些書預計何時可以出版？

許：第一本在明年初或今年年底可以完成，人家出版社不一定有興趣出。

廖：現在這樣的研究很符合現今台灣國內環境的需求，大家開始注意到本土的研究！出版應該不成問題的。

許：我因為喜歡東看西看，所以，用了不少西方的東西，人家不一定喜歡。

廖：是論點？還是……？

許：論點也是，還有我的那些 references 很多都是外文的。

廖：還好吧！現在台灣的出版社，我不認為會有特定的喜好。或者應該說，不管喜不喜歡，他都會出，只要大家想看、能賣。對台灣歷史的理解，目前已經成為顯學。尤其，好多台灣文學系、所相繼成立，大家正苦於沒有好的教材，您的書如果能及時出版，應該會受到歡迎的。

許：我認為台灣史也好、台灣文學研究也好，一定要學術化，尤其要把它科技化。像台灣歷史的話，我覺得一些社會科學如社會學、甚至人類學，最好都能放進去。文學我也是覺得，至少文化理論是要放進去，……我就喜歡東看西看。我研究台灣史，在歷史上，是希望把台灣歷史放在整個世界歷史的脈絡裡；在學術研究上，把台灣歷史放在各個社會科學的領域，也算是一個嘗試，吃力不討好的。我有三個夏天都在大陸，很辛苦。清朝宮中的檔案，運到台灣的有三分之一，另外大約三分之二留在北京。事實上，主要的還在北京，看

書很辛苦，有時候看了一整天，看不出一件需要的資料。

廖：學術研究沒什麼取巧的，就是要花功夫！

許：有時候還有運氣！剛好找到。譬如：乾隆十五年三月，一大包，一個月都翻不完，帶著口罩。

廖：真是辛苦！謝謝許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，祝您的新書早日完成！